

文艺论丛

8

文艺论丛

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九月

文 艺 论 丛

(第 八 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47,000

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6,000 册

书号: 10078·3095 定价: 1.35 元

目 录

“五四”杂忆·····	夏 衍 (1)
回忆“五四”·····	冰 心 (5)

“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	王 瑤 (10)
-------------------	------------

“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	严家炎 (36)
--------------------	------------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

——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	马良春 李葆琰 (61)
--------------------	----------------

“五四”散文与文风·····	郭预衡 (109)
----------------	-------------

李大钊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	秦家琪 谈晓岚 (122)
-------	-----------------

论“五四”精神与“鲁迅的方向”·····	王一纲 (142)
----------------------	-------------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陈独秀·····	吴泰昌 孙玉石 (181)
--------------------	-----------------

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发展过程·····	陈永志 (206)
--------------------	-------------

鲁迅《野草》精神试论·····	许 杰 (229)
-----------------	-------------

论巴金的《家》及其有关批评·····	谭兴国 (285)
--------------------	-------------

读《倪焕之》·····	孙光萱 (311)
-------------	-------------

论朱自清的散文·····	马烽荣 (326)
--------------	-------------

莎士比亚如是说·····	杨周翰 (354)
--------------	-------------

论《奥瑟罗》·····	方 平 (364)
-------------	-------------

论歌德的《浮士德》·····	杜东枝 (418)
----------------	-------------

论巴尔扎克·····	郑克鲁 (438)
------------	-------------

“五 四” 杂 忆

夏 衍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当年参加这次运动的那些青年学生，现在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反对日本侵华的“二十一条”和抗议巴黎和会同意日本侵占青岛，因此五四运动首先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按性质，这还是一次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爱国运动。但不久之后，上海、汉口等地发生了罢市罢工，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同时，不少报刊上提出了反封建、反礼教，号召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唤起劳工的口号。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运动已经越出了爱国反帝的范畴，这已经不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

这一年，我十九岁，在中学念书。“火烧赵家楼”的消息传到杭州之后，省会的各中学学生首先起来响应。六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来了几位代表，杭州各校的学生就在欢迎北京学生的名义下组织起来，成立了杭州学生联合会。一位身躯魁梧、善于演说的北大学生在公开讲演的时候，谈的还是“外争国权，内

• 1 •

除国贼”，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学校的代表单独谈话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打倒封建礼教”、“男女平等”和“劳工神圣”等口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三年。北京的进步学生已经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青年人到浙江省教育会去找陈望道、刘大白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从他们口中听到了“社会主义”这一个名词。九月间，我们大约十一、二人筹备出版一个旬刊，在同年十月十日出版，这就是《浙江新潮》的前身《双十》旬刊。《双十》出了两期之后，改名为《浙江新潮》，在发刊词上提出了“四种旨趣”：“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可以看出，这个刊物是受了北京进步学生的影响，已经从民族、民主革命前进了一步，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主要落在劳动阶级身上了。

当时，除北京大学外，南方还有两个进步学校，一个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另一个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浙江一师的校长是教育界前辈、享有很高声誉的经亨颐（子渊）先生。由于他请了四位有名的教员，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一师“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师成了浙江乃至江南一带的学生运动的中心，《浙江新潮》就是在经先生的影响和鼓励下办起来的。这个刊物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是谁，我至今还不知道。解放后听施存统说，主要是第一师范和第一中学的学生，如宣锺华、俞秀松等。宣锺华同志是浙江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在“四·一二”以后英勇牺牲。最近我回忆一下，《浙江新潮》的同人 都已经先后去世了。

《浙江新潮》出版到第三期，因为施存统写了一篇题名《非

孝》的文章，就在整个浙江文化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我和施存统不很熟悉，听人说，他本人是一个孝顺母亲的“孝子”，可是在那个时代，这篇文章的题目倒确是可以算得上“过激”的了。这篇文章成了引火点，在浙江的教育界、思想界的左右两派中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杭州各中学校长中的旧派人物，也就是当时的所谓“校长团”，以“非孝”为罪名，还加上了“公妻”、“共产”等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勾结最反动的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对新派的一师校长经子渊和“四大金刚”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其实，这一场斗争已经酝酿了好久，旧派要打击和赶走经子渊，主要是因为他在一师采取了一些进步改革，深得学生拥护，其他各校学生就引据一师的先例，要求各校也作同样的改革。所以旧派抓住《非孝》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攻击一师的借口而已。为什么发表在《浙江新潮》上的文章可以成为反对第一师范和经子渊的借口？这第一是因为施存统和大多数《浙江新潮》同人都是第一师范的学生；第二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浙江新潮》的广告上写了“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从《浙江新潮》的内容来看，这份刊物已经很明白地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例如，在第一期上，我们就转载了日本《赤》杂志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下面还加了一个注解：“布尔什维克即过激党”，这显然是很不策略的。于是守旧派就把这一批青年人扣上了“过激党”的帽子，在一九一九年冬天查禁了《浙江新潮》，接着在次年二月，将经子渊免职，赶走了“四大金刚”，改组了一师。一师师生在其他各校支援下奋起反抗这种种倒行逆施。反动派为了镇压，在三月间派军警包围第一师范，打伤学生，造成了著名的“一师风潮”。虽然后来经子渊和几位教员离开了浙江，但反动派没有能够压垮一

师的进步力量。

当时的守旧派把《双十》、《浙江新潮》看作洪水猛兽，叫嚷浙江出了“过激党”。其实，尽管这个刊物的主要负责人中的确有象宣锺华那样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而绝大多数仍然是民族、民主主义者。我当时是同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只是由于经常向人借读《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些进步杂志才被吸收入社的。那时候思想界十分活跃，也没有什么书报检查制度。许多报刊，例如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从一九一八年起就介绍当代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还是很大的，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一本书。总之，那时候杭州的学生运动在思想方面还很浮浅、庞杂，进步学生深深感到封建思想必须打倒，而对于将来社会改造的途径却不甚了了。虽然如此，这运动毕竟激发了广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并且把一大批工人、店员卷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洪流，因而为一九二一年以后在浙江建立党组织准备了条件。

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花甲”。然而当时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却依然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当时以为不难推倒的封建主义，它的经济基础今天已经摧毁，但它那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思想意识到现在还极其顽固，阻碍着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而且民主和科学又是分不开的。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指针，没有先进的自然科学来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民主也就无法实现。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和科学尽力，我以为，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对“五四”最好的纪念。

一九七九年四月

回 忆 “五 四”

冰 心

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地美好与光明。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的祖国也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所梦寐以求的科学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表达的……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真地给科学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

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的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到烟台来吗？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父亲在年轻时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当一九一五年，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她也上台去对大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

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以前他到我们家来，我都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同他讲话。这时为了找发表宣传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惊奇而又欣然地答应了。此后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西，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呢？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我用

“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里应当提到我的父母比较开明，从不阻止我参加学生运动。我的父亲对于抗日救国尤其热心，有时还帮我修改词句。例如在我写的《斯人独憔悴》里，那个爱国青年和他的顽固派父亲的一段对话，就有好几句是我父亲添上的！我们是一边写，一边笑，因为那个老人嘴里的话，都是我所没听过的，我觉得很传神。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西医，而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习惯，那时的女西医还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对于理科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

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我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仄地承认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即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文学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整个潮流在前进，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民主这两盏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

王 瑶

(一) “鲁迅的方向”的普遍性意义

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一向习惯称为“新文学”，这个“新”字的意义是与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相对而言的，说明它“从思想到形式”都与过去的文学有了不同的风貌。这是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尽管古典文学中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品中还有相当多的反帝反封建的因素；但从文学的时代特点和总的风貌来看，只有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才可以说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同呼吸、共脉搏的，才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是由反帝开始的，到这个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以后，就又成了广泛澎湃的反封建运动；当时的群众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① 就有力地表现了这个运动的性质。由于当

^① 见《北京学生致各界书》。

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中国的革命先驱者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的一页。“五四”不但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肇始于“五四”前夕，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号召和影响下，开始寻求有效的革命道路和新的思想武器。它为“五四”爱国运动在思想上做了酝酿和准备，并通过“五四”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新军。“五四”以后各种宣传新思想的白话报刊和群众团体，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当时还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和社会制度。当时的先驱者由于运用了新的思想武器来观察现实，因而对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产生了新的希望和信心；这反过来也就成为寻求革命道理和批判封建文化的强大动力。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这一方面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它也是进行反封建战斗的有力武器，它与封建性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学革命是由提倡白话文开始的，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文学的形式和表达工具的革新，而是体现了如何能使文学更有效地为人民革命服务这一时代要求的。当时不仅主张白话文是一种完美的文学语言，比文言文更富有艺术表现力，尤其强调的是白话

文能够为一般人所看懂，容易普及，而这就实际上体现了文学要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时代要求。除提倡白话文以外，文学革命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对旧文学的封建性内容的批判；开始时主要是针对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五四”后就逐渐扩大到所谓国粹派和鸳鸯蝴蝶派。这种批判十分尖锐，充分体现了“五四”开始的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陈独秀攻击旧文学说：“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①说明反对旧文学是与要求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的表现“人生”、“社会”的新文学密切联系的。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现代文学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深入而得到发展的。所以“新文学”一词中“新”字的最准确的解释，就在于文学与人民革命的紧密联系。鲁迅说他在《新青年》上的小说“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②总的看来，“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使文学更好地为人民革命服务这一光荣使命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中国古典文学中尽管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历史上大的农民战争也在文学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就文学运动和创作的主流说，把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步伐而不断前进的。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我，是对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正是作家的鲜明的爱憎态度的出发点，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的根本依据。用鲁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迅的话说：就是“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①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就现代文学的主流和总的倾向来说，是符合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不同，是作为人民革命的一条战线而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在作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一科学论断时，正是一方面指出了鲁迅“代表民族的大多数”，也就是代表全体革命人民，同时又指出了他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②鲁迅当然是最伟大和最杰出的代表，所以说“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③但“鲁迅的方向”的意义并不仅指鲁迅一个人，而是指从“五四”开始的“文化新军”的整个队伍的，文学就是其中最有一个成绩的部门。这个队伍中的许多人的战绩虽然不能与鲁迅并论，但正如战士与主将的关系一样，从总的倾向说，都是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向着同一方向作出了贡献的。“五四”时期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好些人甚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时也还是民主主义者，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④这个论断是可以概括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者的情况的，说他们“倾向于革命”，就是说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革命对象有所憎；说他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③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